

智库报告质量评价如何评价

□ 周湘智

以高质量成果咨政辅政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目标。智库报告是智库成果的主要表达形式，也是智库作用的主要发挥模式及智库价值的主要证明方式。决策者每天阅读大量材料、接触大量信息，智库报告质量高低决定其能否获得决策者关注，能否顺利进入政策流程，以及最终能否发挥实际效能。评价一份智库报告是否出彩可从八个维度进行衡量。

是否定准站位 “接天线”。文稿立意的站位决定了报告的视野与层次，是智库报告质量优劣的重要变量。撰写智库报告的直接目的是咨政建言、影响决策，行为指向是说服决策者接受和认可报告的内容。因此，政治站位、理论站位、工作站位非常重要。只有在字里行间紧密对接中央的大政方针，充分体现党委政府正在推进的重大战略，切实融入党委政府工作的中心大局，有机贯穿理论的视角与理性的思考，才能奠定智库报告的高度与精度，甚至尽量在导语中指明报告就是为完成当前正在推进的主要任务而产生的成果，如此就能够较好地与决策者的实践思考同频共振，有力彰显研究报告的政治意义与现实意义。要善于站在整体的视角，以决策者的代入感来观察分析问题，切实增强破题的全局性、战略性、针对性。

是否瞄准问题 “强靶向”。开展问题导向下的行动研究是智库报告的根本特征，问题就是智库报告的靶点，帮助决策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智库报告的核心价值。撰写智库报告必须突出问题意识，遵循问题导向，最终倒逼推动问题解决。一个事物的问题有很多，关键是找到核心的问题，做到“不提一般的问题，不一般地提出问题”，始终紧紧扭住事关大局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值得重视的潜在问题，善于把握假问题背后的真问题、小问题背后的大问题、看似不可能发生却又的确发生了的怪问题。智库研究的问题要具体，要打蛇的“七寸”，敢于为决策者揭示他们尚未察觉、未重视、未深入的问题，不忌讳说问题，也不应担心领导“受不住”，问题就是说给领导同志的“知心话”。首先，领导同志并不反感智库反映问题，反而希望听到真问题，只要我们真正能“说到点子上”；其次，智库报告主要通过内参、简报等形式呈报，其阅读范围及风险均自主可控；再次，智库作为第三方，也有相对超脱的优势与说真话的责任；最后，能说真话是智库价值与影响力的重要体现，唯唯诺诺的智库不可能有真正的

影响力。应通过解剖式地分析社会热点、理论难点，建设性地解决两难、三难甚至更难的问题。只有拿准了问题看准了病，才能针对病灶对症下药，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才能当好问题的“粉碎机”。

是否吃准政策 “对上号”。决策者做任何决策都是基于现有政策基础之上的决断、创新与改进。提高智库报告建言献策的有效性、增强建言献策的说服力、确保建言献策的可行性，就必须熟稔所研究问题相关政策法规的详细情况，细致地梳理出当前哪些方面属于已经有政策而且在执行中取得了较好效果，哪些方面属于已有政策但未得到很好的执行，哪些方面属于已经有政策但政策本身不合理甚至成为严重阻碍，哪些方面属于需要出台新的政策等。只有与当前政策、文件展开对话，进行详尽的回溯性政策分析，才能更有的放矢地分析问题，提出务实管用、精确到位的对策，找到政策的增长点，最大限度增强对决策建议的可行性、落地性与精准度。讨论问题如果抛开现有政策来谈，必然缺乏针对性，沦为“空对空”，甚至出现报告研究的问题、提出的对策早已

有政策文件详细回应的尴尬情况。**是否摸准动态 “明方向”。**优秀的智库报告必须较为通透地了解某一问题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全面掌握该问题的前因后果、历史轨迹、现实启示及未来走势，为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奠定前置知识基础。要对所研究问题的国内外形势、发展趋势与竞争态势，与相关领域、相关问题的关联，当前思想理论界对该问题的争议等有较深入的考察。善于“站在现在看未来，站在未来看现在”。智库报告不仅应研究好“今天”的问题，更应研究好“明天”的甚至“后天”的问题，以获得所研究问题的准确画像。其中，应重视研究倾向性、苗头性、潜在性问题，对该问题下一步的演化、下一阶段应该着重考虑的工作，以及下一阶段可能发生的风险、产生的危害，及时进行预测、预警、预判，做到先见、先知、先谋，提醒决策者未雨绸缪，预留提前量，打好主动仗。

是否用准比较 “巧攻玉”。洞见在借鉴中升华，智慧在交流中产生，思路在比较中完善。智库研究报告的撰写应特别重视考察国内国外等的“左邻右舍”在该问题上的探索，深入总结哪些是值得学习借鉴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哪些是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与警示，以便更好地吸收前贤



的营养与能量，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迭代创新。注重将重要指标、重要数据、重要工作与自身实际进行纵向比较，与外部对象进行横向比较。在知己知彼中创新思路、发掘优势、抢抓机遇，在客观对比中明晰差距、挑战与短板，找到自身的正确方位，明确努力的前进方向，采取管用的对策措施。同时，应尽量提出两种以上的解决方案并分析不同方案间的利弊得失，供决策者权衡选择或综合采纳。

是否算准数据 “拓精度”。智库报告是由智库做出的专业研究成果，必须处处体现科学性，用客观详实的数据作为决策建言的支撑应该成为其标配。智库报告对问题的描述、优劣的对比，对趋势的分析、风险的预判，对目标的确定、执行的步骤等都应尽量用具体可靠的数据来论证说明。在决策模式由经验决策向精准决策加速转型的当下，数据即论据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大数据在决策中的广泛运用已成必然，作为服务科学决策的智库报告也必然应深度嵌入大数据方法。简单价值判断式、个人经验式甚至“摸脑袋”式献策，是智库不专业、不负责、不称职的表现。同时，智库提供的数据应该是准确、可信和全面的，避免夸大问题、误导决策、带来被动。

是否把准新意 “有创见”。在海量报告信息充斥决策者眼球的情势下，要想提高智库报告到达决策者案头并获得有关领导同志关注的几率，报告内容的创新性、可读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中，那种四平八稳的腔调、老生常谈的内容、“财务科目”式的语言很难有反馈，那种模棱两可的含糊话、缺乏新意的陈旧话、人云亦云的重复话、不解问题的原则话既无价值也折损声誉。成功引发决策者的阅读

兴趣，促使决策者重视报告的观点，进而推动对策建议进决策入实践，就需尽可能地立足新视角、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做出新论证，尽可能地提供新案例、采集新数据、阐发新概念、提出新观点。报告的标题和内容都需尽量活泼、醒目、直观，善于运用言简意赅、生动活泼的语言。应注重突出重点亮点，摒弃面面俱到，多讲决策者没听过、没见过、没想过的内容，致力于以“新”制胜、以“特”制胜、以“活”制胜。

是否提准对策 “出高招”。对策方案是智库报告的核心内容，也是决策者关注的重点。智库报告的对策建议要遵循科学理性、上下呼应、层次分明原则，方案举措的轻重缓急、时空布局、节点任务、保障条件等都应清晰明了、环环相扣、操作性强。应注重从最迫切的要求出发、最突出的问题入手、最薄弱的环节着力，以“一针见血”的简洁、“刺刀见红”的直接、“刀下见菜”的透彻，研究破解核心问题、瓶颈问题、疑难问题，必要时可对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推演。报告所提对策需尽量避免重复已有的政策措施，更不能隔靴搔痒、蜻蜓点水、雾里看花，必须明确、具体、可行，这也直接关涉一旦获得领导同志批示，便于相关部门采纳与施行，否则报告即使被批转，具体部门也无法办理。应把解决具体问题与解决深层次问题、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小环境与大形势有机结合起来，提出富有深刻洞见、独特创见、战略远见的好主意、妙主意、大主意。



生物安全是一项攸关国家战略利益的系统性工程。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来看，生物安全是指人民的生命健康、生物的正常生存、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防范化解相关威胁状态的能力。

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将生物安全提高到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是着眼当下，防范化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的应有之义。根据党的十九大的总体部署，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从当前情况来说，公共卫生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广义的生物安全的一部分，2019年底，《生物安全法（草案）》已提请最高立法机关首次审议，八个适用范围之首就是“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将疫情防控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部分，有助于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综观国际生物安全形势，从本世纪头十年的相对温和转向近十年的日益严峻，传统生物安全威胁与非传统生物安全威胁交织联动。为应对上述挑战，许多国家已明确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先后出台了本国的生物安全战略，国家间战略博弈也出现了新动向。国内生物安全形势的演变趋向与国际形势大体同步，面临的内外生物安全挑战也日益严峻与复杂。

构建两大治理体系

应以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立法为契机，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筑牢国家生物安全的制度底线。

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实践，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立法应当遵循风险预防、科学证据、全程控制、分级管理、动态监管、协同合作等基本原则。在综合性立法方面，应加快审议生物安全法，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为根本目的，将保护生物资源、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防范生物威胁作为主要任务，从而填补我国生物安全领域基本法的空缺。在专门性立法方面，应妥善处理好生物安全法与生物多样性立法、生态保护立法、野生动植物立法、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立法、生物技术研发与利用立法以及传染病防治、动植物检验检疫立法等下位法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有机衔接的法律法规体系。

构建国家生物安全制度保障体系。其中，关键是建立通用的现代生物安全制度体系。具体而言，应遵循面向全谱生物威胁的综合性防范原则，逐步建立起监测预警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名录清单管理体系、信息共享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应急保障体系、科技决策咨询体系等。此外，还应理顺重点环节的体制机制。具体而言，应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推进人口健康、生物安全等领域科研力量布局；实行基于分部门管理体制的统筹协调机制，以应对生物安全领域广泛而复杂的规制对象；重点守卫国门生物安全，明确海关监管、边境管控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健全生物安全领域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可下设生物安全委员会分会。

提高三个方面治理能力

以出台我国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规划为抓手，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进一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夯实国家生物安全的社会基础。基于当前国内外形势，我国生物安全战略规划可以优先推进三项治理能力建设。

科技支撑能力建设。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是国之利器。对此，应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与能力建设。

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制度底线

□ 黄晓伟

整合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医疗设备等相关领域国家重点科研体系，布局一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加强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加快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

国际合作能力建设。从构建全球生物安全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谋划和倡导各国合作治理生物安全。一是密切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议程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二是借鉴援非抗击埃博拉的有益经验，在科学把握自身情况的基础上加强对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薄弱国家的医疗卫生援助，将国内防控与海外行动相结合，主动防御生物安全之敌于国门之外。三是加强与国际科学共同体的交流，同步推进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确保开展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

人才培养能力建设。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而我国高质量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应大力支持顶尖生物科技专家的攻关工作，培育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并营造宽松包容、安全负责的科研环境。积极引进生物安全领域的海外优秀学者，尤其是青年科技人才，为队伍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加强生物安全的智库战略研究与人才培养，为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生物安全规则的制定。鼓励有条件的高校探索在国家安全学等一级学科下自设生物安全相关的二级学科，组织跨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适当扩大与国家生物安全建设相关的应用型研究生人才培养规模，注重强化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

总之，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加快推进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全方位健全应急保障体系

□ 刘 杰

前方打仗，后方保障。完善的应急保障体系是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快速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2003年“非典”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成功应对了汶川地震、芦山地震、南方罕见雨雪冰冻灾害等一系列重特大突发事件。但在应对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应急保障方面的诸多问题，如应急物资储备结构不合理、快速调运配送效率不高、资源共享和应急征用补偿机制有待健全等。为此，应针对应急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不断健全周到、顺畅、管用、便捷的应急保障体系，逐步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健全信息共享、决策智能的应急指挥保障体系。注重应急指挥一盘棋，完善应急救灾指挥工作方案，落实分级指挥和专业技术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模式，提高指挥效率。推进救援力量一体化，突出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以专业救援队伍为协同、以军队和武警部队为突击、以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建设。推进国家和各地应急指挥中心平台建设，集成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和应急指挥一张图，实现风险监测预警、应急指挥调度、救援资源管理、智能决策支持等功能，提升科学

决策指挥处置能力。

健全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在此次疫情防控初期，包括医疗防护用品、消杀用品、检测检验仪器设备等在内的重点物资需求量大激增，尤其医用防护服和医用N95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更供不应求。虽然国家紧急采取了产能统一收储，支持企业扩产、转产、新建等措施，但受制于时间特殊、原料供应、人工缺口等因素，仍然一“罩”难求。提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物资保障水平，需健全应急物资保障网络，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对应急物资集中管理、统一调拨、统一配送，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不失误。对短期可能出现的物资供应短缺问题，可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统一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定点生产、规范质量标准。

健全多维立体、平战结合的应急运输保障体系。应急运输是生命线，救援物资、生活物资和电、煤、燃油等生产物资能否快速运抵，直接关系到相关地区群众的安危。应立足“平战结合”理念，加强应急运力储备，畅通运输通道和物流配送，进一步提高紧急运输能力。完善立体化交通运输网络，建设综合性智慧交通应急指挥中心，提高快速运输通行效率和保

障能力。完善运力紧急调用和征用补偿机制，优化运力储备结构，确保关键时刻运力有保障。整合利用社会化物流资源在前端供应采购、后端配送规划、资源和库存配置等方面的优势，保障物资供应和配送。加强战时应急运输协调，畅通应急运输绿色通道。

健全快速反应、救治有效的应急医疗保障体系。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此，应建立健全分级分类的紧急医学救援队伍，构建海陆空立体化紧急救援网络，大力发展空中救护，让救援力量能够快速到达第一现场。强化快速反应，提升突发事件现场检伤分类救治和伤员快速安全转运的能力。充实紧急医学救援力量，加强国家及区域性紧急医学救援指挥中心和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增强一线人员的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夯实基层紧急医学救援基础。

健全畅通互通、安全可靠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信在国家公共安全，特别是突发事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型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也会造成通讯基站的损坏和通讯信号的中断，给救援行动带来极大的阻碍。